



南京政治学院名师文集



兵苑学思

SCHOLARY ACQUIREMENTS
FROM MILITARY CAREER

张云 著

解放军出版社

兵苑学思

张 云 著

解放军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兵苑学思/张云著.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 2006
ISBN 7—5065—5324—4
I. 兵… II. 张… III. 军事—文集
IV. E—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41717 号

书 名: 兵苑学思

作 者: 张 云
责任编辑: 李建力
封面设计: 管 剑
责任校对: 郭艳丽
出版发行: 解放军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政编码: 100035
电 话: 66531659
E-mail: jfjcs@public.bta.net.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南京政治学院印刷厂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字 数: 419 千字
印 张: 28.5
插 页: 8
印 数: 1—1000 册
版 次: 2007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1 月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5—5324—4/E·2250
定 价: 56.00 元

(如有印刷、装订错误, 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积极推进“人才强校”战略

——《南京政治学院名师文集》总序

军校教员是办好军事院校的主导力量，是培养高素质军事人才的主要承担者。培养一流的人才，就要有一流的教员。南京政治学院党委高度重视教员队伍建设，始终坚持“人才强校”战略，把教员队伍建设作为学院建设发展的基础性工作，摆到重要议事日程。2005年学院从全院教员中评选出了10名教授为南京政治学院第二届名师。如今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10本文集，就是从他们已经发表的各类学术文章中精选出的一部分科研成果的汇编。这套文集不仅记录了他们丰富的人生阅历，汇集了他们从教几十年主要教学科研成果，更重要的是展示了他们默默无闻、无私奉献的精神。对《南京政治学院名师文集》的出版，我们由衷地表示祝贺！愿这套凝聚着名师心血、汗水和智慧的文集，能给读者带来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南京政治学院是直属总政治部领导的正军级中级任职教育院校，是全军“2110工程”重点建设院校，是全军研究生培养单位重点建设院校。建院以来，院党委认真贯彻落实军委和总部关于加强院校教员队伍建设的重要指示，坚持“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方针，从提高院校教育水平和培养大批高素质军事人才的需要出发，积极推进“人才强校”战略，狠抓教员队伍建设，取得了明显成效，基本形成了一支综合素质过硬的教员队伍。这支队伍有“风吹不动，浪打不摇”的马列主义信仰，有“人有家财万贯，我有桃李三千”的高尚追求，有“与时俱进，不懈探索”的理论勇气，有“身系国防，教书育人”的强烈使命感。他们甘为人梯的人格魅力，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严谨求实、勇于创新的治学态度和骄人的学术成果，筑就了南京政治学院厚重的根基，获得了党和军队的褒奖。1985年以来，先后有4名教员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有25名教员被评为全军优秀教员，有35名教员享受

国家政府特殊津贴，有55名教员获得军队院校“育才奖”，有24名教员享受军队优秀专业技术人才岗位津贴。

在复杂的国际环境和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为履行好我军新世纪新阶段的历史使命，即“为党巩固执政地位提供重要的力量保证，为维护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提供坚强的安全保障，为维护国家利益提供有力的战略支撑，为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发挥重要作用”，我们将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院校建设的正确方向，继续抓好教员队伍建设。我们将以先进性要求为标准，与时俱进，深入进行院校教育改革，扎扎实实地提高人才培养和办学质量，朝着建设全军一流的中级任职教育院校这个目标不懈努力，续写南京政治学院历史的新篇章，为我军现代化建设跨越式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智慧和力量。

《南京政治学院名师文集》的出版，得到了解放军出版社郑晖副总编、军事编辑部王世光主任、李建力编辑的大力帮助，得到了学院各级党委、领导和名师的热情支持。值此文集出版之际，谨向所有关心、指导和参与文集出版的领导和同志们致以深深的感谢！

南京政治学院院长 王建伟

南京政治学院政治委员 文忠民

二〇〇六年四月一日

融会党史与军事史研究： 从戎三军的学者

——张云教授访谈（代序）

张云 谢宝耿

●张云，1947年生，江苏启东市人。复旦大学历史学硕士，现任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军事历史研究》主编，大校军衔。兼任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常委、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会长、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特约研究员、复旦大学韩国朝鲜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上海大学兼职教授、中国孙子兵法研究学会理事、上海市国防研究所兼职教授、华东理工大学战争文化与国际政治研究所兼职教授等。长期从事中国近现代通史、中国共产党党史、中华民国史、中国军事史、中国近现代国防史、军事思想和军事史学理论等领域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发表著作20部（包括主编、合著），论文120余篇，约500余万字。其中《汪精卫集团投敌》、《汪精卫国民政府成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获1979~1985年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奖；《潘汉年传奇》（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出版），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1997~1998年成果奖著作类二等奖。主要学术事迹被收入《中国教育专家名典》、《世界名人录·中国卷》、《上海市当代哲学社会科学家辞典》等。

○谢宝耿，上海《学术月刊》编辑部编审。

○张教授，我刊对中青年专家的访谈，不但注意他们的学术成就，还兼及学者的代表性。您作为学者型的军人，颇有独特之处。能否先谈谈您是怎么走上学术之路的？

●我这个人经历比较丰富。1947年我出生在江苏启东县

(1996年撤县建市)一个农民的家庭。启东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素享鱼米之乡的称谓。我的母校吕四中学,位于美丽而富有传奇色彩的吕四大渔港。吕四,相传是“八仙过海”之一的吕洞宾曾四次光顾此地而得名;吕四又称鹤城,相传很久以前此地是仙鹤息居之处。1966年高中毕业时,一场“文化大革命”打碎了我进大学之梦,命运将我送到了军营。

1968年4月,我穿上了海军军装,奔赴福建前线。我被分配到闽北宁德地区三都岛海军福建基地司令部警卫连。因我是66届高中毕业生,在那个时候的连队里,算是“高级”知识分子了。三个月以后,我就当上了连队的文书;又过了三个月,我被调到基地政治部宣传处,担任新闻报道员。从1969年初开始,我进入了海军新闻工作者的行列。我和战友们往来于福建沿海的大小岛屿,出入于各岸炮和舰艇部队,调查采访,以新闻报道和小评论的形式,在《海军报》、《前线报》、《福建日报》、《前线通讯》等报刊杂志上,发表了不少“豆腐干”文章,反映前线部队的现实生活。1971年下半年,机关为了培养我,任命我为海军高炮部队某部炮连排长,下基层去体验部队生活,锻炼和提高自己的军人素质,而后回机关提升连职新闻干事。原本,我是能够在新闻战线上发展的,但一个偶尔的机会,改变了我的人生之旅。

1972年春节刚过,我在海军高炮部队任职还不到半年,海军政治部给福建基地政治部分配了一个推荐上复旦大学的名额,政治部与宣传处的领导选中了我。当我得知这一消息后,激动得彻夜难眠。3月底,我离开了福建前线的军营,从福州登上了北上的列车,来到了中国第一大都市——上海,进入了闻名遐迩的复旦大学历史系。

我此时此刻置身于高等学府,有幸聆听名牌大学教授们的谆谆教诲。当时,历史系的中国古代史课由谭其骧、杨宽等著名教授主讲;中国近代史由胡绳武、樊树志等先生主讲;中国现代史(包括中共党史)由余子道、黄美真、方晓升等先生主讲;世界史则由程博洪、庄锡昌、金重远等先生主讲……1975年9月毕业,我被历史系留下,脱下了军装,从一名海军军官变成了复旦大学的青年教师。不久,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复旦大学也迎来了中国教育事业的春天。

○进入复旦大学是您从军人到教师的转折，也可说是您走上学术之路的起步阶段。

●是的。从1976年开始，我负责历史系的学生工作，并致力于中国近现代史的教学与科研，我先后开设了“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中国现代史”、“中国国民党党史”、“汪伪政权史研究”等课程。在完成教学工作的同时，我先后独立承担或与人合作撰写、编纂了《解放上海》、《上海大学史略》、《汪精卫集团投敌》、《汪精卫国民政府成立》、《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史略》、《五卅运动》等论著。1985年我被复旦大学历史系评为讲师，同时就读在职研究生，1987年9月获复旦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

就在这一年下半年，我被特招到上海空军政治学院，又穿起了军装，这是我第二次入伍，不过是作为一名空军军官而不是海军军官。1999年8月全军军事院校调整时，空军政治学院改名为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隶属于总政治部，我又改穿绿军装，成为一名陆军军官了。就这样，我先后在海军、空军、陆军部队里服役，从戎三军。然而，我的潜意识告诉我：我仍然是一介书生。

○您的经历确实很丰富：从戎海（军）、陆（军）、空（军），学贯古（代）、近（代）、现（代）；而且从军人到书生，又从书生到军人。那么您再次服役后，如何在军中从事学术研究呢？

●跨入军校大门之后，我只是从哲学社会科学五路大军中的一路转移到了另一路。我非常佩服军校领导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方面所作的种种努力，正是在他们的支持关怀下，我始终没有脱离教学岗位，始终没有脱离学术研究领域，先后担任了《军事历史研究》的副主编、主编，由副教授、正教授而博士生导师，从中校、上校到大校，我被校方评为知名教授。这十多年来，由于军校的特点和我本人的专业，特别是出于学科建设的需要，我主要从事中国军事史、中共党史（现代史）领域的教学和研究；先后开设了“中国军事史学概论”、“中国军事史研究”、“中国军事思想史”、“中国近代国防史”、“马克思主义与中国近现代军事”、“马克思主义军事史学”等课程，撰写和编纂（包括与他人合作）的论著有《中国近代军事思想和

军队建设》、《中国共产党七十年》、《中国历史命运的大抉择——从蒋介石到毛泽东》、《世纪大角逐》、《潘汉年传奇》、《一场奇特的战争——中国工农红军反“围剿”战争史实》、《中国共产党八十年》、《八一三淞沪抗战》、《智者谋略》、《朝鲜战争研究的现状及其未来展望》、《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巴尔干抵抗运动——兼论小国在大战中的历史地位》、《论〈孙子兵法〉的国家安全战略》、《论〈孙子兵法〉的战略欲望观》等。

○您的《潘汉年传奇》，我印象特别深刻。当时电视台播放连续剧《潘汉年》，影响极大，几乎家喻户晓；潘汉年的扮演者、主演王华英在接受电视采访时，问到你为什么演出这么成功，他谈了一些原因，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反复拜读了您的大作《潘汉年传奇》。您能使学术成果尽快被艺术吸收、为现实服务，这很了不起。

●谢谢您的赞扬。其实，为潘汉年作传，对于我来说，是一件遂心愿的事情。早在1982年下半年，即潘汉年平反昭雪的日子，我正执教于复旦大学历史系，主讲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承担着抗日战争史、汪伪政权史的研究课题，出于对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的考虑，并受责任心和正义感的驱使，我便萌发了撰写一部潘汉年传记的念头。于是，我像海绵吸水一般，悉数搜集潘汉年的有关史料、回忆录和研究论著。1987年秋，我被特招到空军政治学院，“置身于营幕”之中，不得不将这件事暂时搁了下来。直到1995年初，才又将此事提到了我的议事日程上来，着手进行写作。

潘汉年是一位充满神秘色彩的职业革命家，是中共党内高级领导层中的传奇式人物。潘汉年的一生，虽然坎坷曲折，但却令人敬佩；虽然光照千秋，但却叫人叹惜。他有着特殊的功绩，也有着特殊的遭遇。就是这位历史的功臣，却成了共和国的第一个大冤案的主人。由于长期在隐蔽战线工作，由于潘本人极强的党性原则，又由于蒙冤入狱长达27年之久，许多重大的而且生动的史迹被湮没了。因此，要为潘汉年著述一部准确、可靠的传记类信史，的确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我和我的同行们都有这么一个感觉：现在人物类传记可以说是多如牛毛，但是缺少的是一个“信”字。史学研究当然需要而且允许采用直观思维、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等方法，以还原历史的本

来面目、揭示历史的本来规律为己任；但历史研究最忌的是捕风捉影、妙笔生花、随心所欲。不少人物类传记采取胡编乱造、张冠李戴的手法，使历史人物面目全非。史学工作者的一个神圣而长期的使命，就是给我们的社会、给我们的时代，特别是给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真史、信史。据此原则，我在先前搜集到的大量史料的基础上，又搜集了许多新的史料，在数易其稿之后，终于在1996年12月潘汉年诞辰90周年前夕，这部《潘汉年传奇》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

○据了解，《潘汉年传奇》先后再版四次，发行量高达4万册。在学术性、人物传记类的著作中，这样高的发行量是不太多的，那么请问其奥秘何在？

●我想这部书的责任编辑、上海人民出版社编审曹培蕾为我写的书评《展示历史真相——读〈潘汉年传奇〉》（载《文汇报》1997年4月15日），也许能回答您的问题。文中写道：“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军人学者张云大校的新著《潘汉年传奇》，是一本中国人心目中盼望和等待已久的人物传记。潘汉年的一生，复杂而不寻常，是一段不易表述的历史，因为他的革命经历充满了惊险与奇特、辛劳与辉煌，也充满了坎坷与不幸。该书以近30万字的篇幅，为读者打开了尘封的历史，展示了历史的真相。”这就是我前面所说的“真史”、“信史”之价值所起的作用。从学术上说，曹培蕾编审概括了该书三个特点：第一，材料丰赡，是该书的显著特色，即“人物传记，必须有丰富的材料作依据，这是史家之笔法，也是赢得读者的首要条件。”第二，充分反映传主曲折人生，是人物传记留给读者印象至深的内容；作者熟练地驾驭各种材料，将潘汉年一生的经历铺陈得曲折、感人，成了本书的又一特色。第三，写好一个人物传记，除了写他的形，还应写出他的神，这一特色，在众多的人物传记中，尤其是革命人物传记中是很难见到的；作者在勾勒潘汉年形象时特别注意表现他的内心世界，做到了形神兼备。曹培蕾认为，《潘汉年传奇》的这种写法，“应该说这是一种文化贡献，显示了作者厚实的学术功底和力透纸背的史著才识”。

○您为什么在人物类研究和写作方面下很大功夫，其潜意识是怎么考虑的？

●诚如您所说，我对人物类研究确实下了较大的功夫。此前我在中共党史和中国现代史研究领域，虽然编纂过两部通史类著作，但在编纂中使我感到，研究历史包括研究中共党史和中国军事史，首先应着重于研究人和事，事在人为嘛，人是历史活动的主体，研究历史科学的任何一个门类，都离不开对于人物的研究。因此，我特别重视人物研究。

○那么，在人物方面，除了潘汉年，您还撰写了哪些人？

●1994年，我应上海人民出版社之约，撰写了《中国历史命运的大抉择——从蒋介石到毛泽东》，这是一个政治性强而又特别敏感的课题，学术界当时还没有出版过以蒋介石和毛泽东为主体的双人传。

○请谈谈其研究和写作背景。

●20世纪上半叶，中华民族面临着两种命运的大抉择。当五四运动划出了中国由近代步入现代的标记之后，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就明明白白地摆在了每一个中国人的面前。对此，跃上中国政坛的各个阶级、各种党派，他们出于各自的需求，进行着不同的选择。历史终于把两大势力推到了前台：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南京政府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于是，围绕着建立一个什么样的中国，国共两党展开了一场生死搏斗，留下了一段错综复杂而又绚丽多彩的历史篇章。在这段历史的进程中，蒋介石和毛泽东无疑是这场命运之争的中心人物。在这部著作中，我力图以这两位历史人物的活动为线索来展示中国现代历史的风云，揭示现代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在我看来，几乎生活在同一个历史时期的蒋介石和毛泽东，他们的活动和较量并不仅仅代表他们的个人，而是代表了两个不同的时代，代表了两个互相对立的阶级。作为旧中国最后一个朝代的最高统治者蒋介石，最终败在小他6岁的毛泽东手下，中国社会立即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旧中国在这里圈上了句号，新中国的巨轮从这里开始扬帆起航。但在这一历史的结论得出之前，应该怎样实事求是地、不带任何的框架、不受“成者为王，败者为寇”观念的束缚，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和方法来研究历史人物，这是一个史学研究工作者必须具备的素养。通过史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我觉得我不能轻视蒋介石，反而仰视他。

○您公开持这种见解，勇气从何而来呢？

●我就是靠改革开放、政治清明的依托，靠写“真史”、“信史”的动力而努力研究的。我认为，在中国现代史上，蒋介石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属于人之杰；但是我也认为，毛泽东比蒋介石更高明，在他们22年的争斗角逐中间，毛泽东在政治、思想、军事等领域，在治国、治党、治军等方面，都胜蒋一筹，而主要的还在于毛泽东的所作所为顺应了时代的潮流，取得了民心，而蒋介石未能做到这一点。因此，我在全书的结尾，引用了美国作家R·特里尔在《毛泽东传》一书中的结论，即该书形象地把民心比作挂在贾宝玉脖子上的那块通灵宝玉，毛所以胜、蒋所以败，是因为毛泽东得到了通灵宝玉，而蒋介石则丢掉了。

○据我了解该书出版后，受到了学术界的关注，如知名学者、复旦大学历史系徐矛教授发表了书评《两个巨人与整个中国——评介〈从蒋介石到毛泽东〉》（载《文汇报》1994年12月18日），那么请问该书的学术价值、突出之处又如何呢？

●借用您所提到的书评，也许能说明一二。徐矛先生在书评中说：“军人学者张云上校（按：当时还未晋升大校）的新著《中国历史命运的大抉择——从蒋介石到毛泽东》，以丰富的史料、独特的视角、清新的文字格调，勾勒了毛泽东和蒋介石两个政坛巨人20余年的生死较量，展现了波涌云飞的现代中国政治大动荡和社会大分化的历史画面。这是作者继参与主编70万字的《中国共产党七十年》之后又一部通览中国现代历史的著作，在学术上和社会教育上都有一定意义。……《从蒋介石到毛泽东》是人物比较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迄今尚未见到有人把这两个代表了两极世界的‘庞然大物’拿来比较研究的，这样做需要相当的胆略和功力。张云以军人的气质和从事现代史研究20年、著述250万字的学术工作经验，选择了这一难度较高的课题，终于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对于蒋介石和毛泽东历史已有结论，现在再要写出有新意的书来，的确比较困难。但是，研究复杂的政治顶尖性的人物，最忌采用简单演绎现成结论的方法。《从蒋介石到毛泽东》的作者不从现有结论出发，而是全面占有材料，运用科学方法，进行具体的实事求是的分析。通过这样的研究，虽然在总体上可能会与现有科

学结论得出相同的结果（作者在后记中生动地记述了他的这一思考历程），但这决不是简单意义上的重复，而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有充分论据的实际论证过程，给予读者是新鲜的、生动的、令人信服的启示。因此，读《从蒋介石到毛泽东》，你不会看到旧理论的演绎，而会见到作者对历史的独特理解和重现历史斑斓色彩的描述。”

我感谢徐矛先生的鼓励。但有一点我是意识到的，这就是全书的确是对这两位“庞然大物”作了实事求是的评价。因此当本书参加 1994 年广州书展时，即被台湾知青频道出版社的书商看中了，经过我半年多时间的改写，在该社顶尖书系丛书里，以题为《世纪大角逐》的书名，向社会推出。这样的结局，我想大概主要是台湾知青频道出版社的书商们看中了这部书对蒋介石、毛泽东的评价是客观的、公正的，是可以作为他们的顶尖书系之一推向社会的。

除上述两部人物类传记外，我对党史、现代史上的其他人物也有较大的兴趣。我先后撰写过《大革命时期的汪精卫》、《抗日战争时期蒋汪关系研究》、《论孙中山的军事教育思想》、《论周恩来军队政治工作的理论与实践》、《以现代化为中心是邓小平军队建设思想的核心》、《试论江泽民科技强军战略思想的时代内涵》、《论五四时期陈独秀思想的转变》以及《周佛海》、《褚民谊》等论著，在对上述个案的研究中，我原则上都要求自己有一定的独到见解。

○您对人物类的研究可以说是成绩斐然。据我所知，您在军事史研究方面也颇有成就，请略作介绍。

●在中国军事史研究领域，我的主要兴趣是在中国近现代军事方面。我较早地考察了中国近代军事思想的发展轨迹，我认为，中国近代军事思想是在中国社会由古代进入近代的历史进程中，逐步形成、发展，并且出现骤变、飞跃。这一过程的每一个环节，都深深地刻上了社会剧烈变动的印记，显露了中国近代军事思想发展的特殊逻辑。因此，我的结论是循着中国社会剧烈变动的轨迹而产生、而发展、而变化、而飞跃，是中国近代军事思想发展的特殊逻辑。这在世界近代军事思想发展史上是独树一帜的。

这一结论，是基于我对西方近代军事思想的历史进程作了

考察之后得出的。西方近代军事思想的历史进程是：17至18世纪，资本主义在欧洲根深蒂固的封建土地上萌生。随着社会生产关系的改革和社会生产力特别是工业生产的蓬勃发展，以及新的军事技术在战争中的应用特别是依靠火器装备起来的庞大常备军的建立，为近代军事思想的产生创造了“最有利的经济、社会政治和军事条件”。一批资产阶级军事思想的奠基者应运而生，如英国的亨利·劳埃德，法国的拿破仑、若米尼，德国的弗里德里希二世、卡尔·冯·克劳塞维茨，俄国的鲁缅采夫、苏沃洛夫、库图佐夫等。他们潜心于对战争问题、武装斗争和军队建设等方面的知识进行逻辑总结并使之系统化，终于结出了丰硕之果。若米尼的《战争艺术概论》、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等，是这一时期最杰出的代表作。19世纪中叶以后，由于西方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的突飞猛进，各式各样的新机器和新技术普遍而迅速地运用于军事方面，出现了“各种新的军事装备和技术兵器”，以及与此相适应的“新的战术动作和新的战斗战役方法”，不仅陆军，而且海军、空军都更加依赖于国家的经济和后方，西方军事思想的发展不能不有个新的突破。于是又出现了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菲利普·科洛姆的“海军制胜论”，朱利奥·杜黑的“空军制胜论”，富勒、古德里安的“坦克制胜论”和“机械化战争论”，以及老毛奇和施里芬的“速决战”、“歼灭战”思想，利德尔·哈特的“间接路线”战略，鲁登道夫的“总体战”，希特勒的“闪击战”理论等等，构筑了垄断资本主义时代资产阶级军事思想的新框架。

接着，我从中国社会条件中寻找了中国近代军事思想的发展逻辑为什么有别于西方的原因：1840年的鸦片战争，标志着中国社会由古代步入近代。在西方帝国主义势力的冲击下，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开始解体，中国由独立的封闭式的封建社会逐步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演变。近代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决定了生产力发展主体的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必然会受到国内封建势力和国际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双重压迫。这种状况，在鸦片战争之后出现，经过110年，到新中国成立之前一直未能得到改观。在这段历史时期中，中国“资本涸竭之病”越发严重，处于病入膏肓而不可收拾的局面。中国军队的改

革、中国近代军事思想的发展，正是在这种“奇穷之余”的社会环境下进行的。军事上的发展既有其迫切性，又有其局限性，即经济落后、民族危急、战乱纷起、民不聊生、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异常尖锐。为了改变国家的落后状况，拯救民族于水火之中，造反、改革、革命，人民武装斗争风起云涌，连绵不绝；同时，为进一步控制中国，帝国主义列强发动了频繁的侵华战争，又应证了“落后必然要挨打”的科学论断；而统治阶级内部为争权夺利，也时常制造各种摩擦和武装冲突。中国近代军事思想的发展在如此背景下，是不能按部就班的，不可能如同西方军事思想发展顺理成章地以日益增长的生产力为前提，以高度发展的经济水平为杠杆，通过战争实践去更新和发展。中国近代军事思想的发展，是靠迫切要求改变现状而去模仿西方、学习西方的内在因素推动，在战火熏陶下，在动荡而剧变的历程中走完了自己的路程。正因为成型之路不同，中国近代军事思想独具特色。

○那么，请问中国近代军事思想的特点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我认为主要有三点：一个显著的特点是，伦理观念在中国近代军事思想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伦理观念，亦即道德观念，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上层建筑和特殊意识形态，是以善恶为评价标准的，通过社会舆论、传统习惯和内心信念来维系、调整人们的行为规范。当中国近代军事思想以跃进方式从古代军事思想的基础上迅速演进时，未曾来得及受到检讨而筛选的传统伦理道德，不仅在军事思想的层面上，甚至在其深层领域都十分强烈地表现出来。当然，道德观念有严格的阶级属性。“忠君报国”、“成仁取义”，以及所谓“智、信、仁、勇、严”那一套，历来是封建社会所倡导的军人的一种特殊的道德观念。在近代封建制度沉沦、皇朝大厦崩塌之际，这种封建的道德观念影响却仍然存在，并且广泛而普遍地成为军人生活的准则。不用说完全意义上的封建地主阶级军队八旗、绿营，以及后起的实行过改革、企图“别树一帜”的湘淮军，都要慑服于“皇恩”的感化，受制于“忠君”思想的心理约束；也不用说曾经叩开中国军队全面近代化大门的新军，从其创练之始，即把“忠义”之道视为行动的最高准则，每逢节日，全营上

下，“行三跪九叩礼”，“三呼万岁”，“忠节、礼度、信义、武勇、朴诚”之声“不绝于耳”；就是到了民国时期，标榜“共和”卫道士的国民党军队，虽然大大讳忌“皇恩”、“皇德”，但始终“道必师古”，提倡尊孔读经，行所谓“礼义廉耻”四维和“尽忠孝、行仁爱、尚信义、讲和平”八德，以完善军人自身之修养。足见封建道德观念在国民党军队中受重视的程度了。中国传统道德观念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它被吸收、被扬弃的历史筛选过程，基本上同中国近代军事思想发展轨迹相一致，并且深刻地反映了中国近代军事思想发展的时代和阶级特色。

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具有多元化的结构层次。在近代中国西风东渐、新旧激荡中建筑起来的近代军事思想的构架，其内容五花八门。诞生于古代军事思想母体上的近代军事思想作为一个新生儿，它跨越了中世纪而步入近代，因而不能不保留其先辈的遗传因素，又不能不接受新时代中的世界概念。西方军事思想越是广泛传播，中国军事思想越会受到冲击。从总体上考察，近代中国110年，军事思想领域新旧交换，良莠并存的现象贯穿其发展过程的始终。在这个领域，既体现了中国古已有之的传统军事思想的光彩，又全面经受着西方近代多种军事思想流派的渗透。从近代众多的军事家、战略家们所创造的各自军事思想考察，清一色者是没有的。从林则徐、魏源到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乃至袁世凯、蒋介石，虽然学习西方，吸收洋人东西以及保留中国古代传统的程度有所不同，但与前辈相比较，毕竟面目一新。蒋介石等人提倡所谓“智仁勇”，又把“三民主义”、德日法西斯主义和西方先进的军事技术熔于一炉。总之，无论从整体还是个体、从宏观还是微观上考察，都生动地体现了中国近代军事思想这种多元化结构层次的特点。

中国近代军事思想的第三个特点，无论是内容还是结构层次，总是由低级向高级，由低层次向高层次，由进步替代落后，逐步转变、递嬗、更新、完善，体现了中国近代军事思想发展的总趋势。林则徐等有识之士为拯救民族危亡，反对外族入侵，而大声疾呼，求武器变革，求装备更新，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这是救亡图存和思想启蒙运动在军事领

域中的反映。然而，它毕竟处于低级阶段，是第一步。甲午战争后，人们从重视武器装备到重视军制改革，中国近代军事思想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缩短了同西方军事思想的距离。如果说，在这以前已经初步筑成了近代军事思想的理论构架，那么，自辛亥革命至新中国诞生前，人们开始把政治统帅军事当作军事活动的一条主线，主张通过武装斗争，推翻旧的政治体制，改革旧的军事制度，改造旧的军队，以建立新的国家机器。中国近代军事思想的发展，正是沿着这一轨迹，走完了自己的路途。

○ 您的军事史研究思想，是如何贯彻到您所主编的《军事历史研究》杂志中去？

● 毋庸讳言，我是军人兼书生，对于军事历史研究，是情有独钟的。我主编的《军事历史研究》是军事历史科学研究领域一份创刊早、容量大、涵盖面广的大型综合性学术刊物。该刊自1986年创刊至今，已历经十七个春秋，共出了66期，近两千万文字，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我把《军事历史研究》的定位标准放在：发挥专业特长，继续瞄准构建军事史学科体系这一高度，进一步从基础性、系统性、科学性要求出发，既要加强宏观层面上的理论研究，如治军治兵思想、战争指导规律、国防理论、兵家兵略、军事制度、军事学术、军事文化、军事教育、军事伦理等，也要深化微观具体问题的分析，如典型战例、军事人物、军事论著及军事史料的评述、军事史学术研究信息的传播；既要重视军事历史内容的阐述，又要强调现实军事问题的探讨，在研究古今中外军事史的同时，绝不能忽视对诸如军事革命、周边军情等现实问题的研讨。为繁荣军事科学、建筑军事历史完整的学科体系，加倍努力，再作贡献。因此服务于军队建设，贡献于国防事业，这无疑是《军事历史研究》一个崇高的奋斗目标，一项义不容辞的神圣使命。

○ 我们因攻克课题曾一起在上海历史研究所共同奋斗过，我为完成任务，几乎每天研读到深夜2点钟，相比之下，您要悠闲得多。而任务却完成得很出色，不少人戏称您为“写作机器”，意即出手快、效率高、成果多，请谈谈您治学和科研方面的诀窍。

● 那段共同奋斗的经历令人难忘，对于您的刻苦研读精